

#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五十五期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编者的话：**性格即命运。这句话既可以形容一个人，也可以形容一个组织。罗隆基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民盟作为中国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都是如此。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也标识出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命运。

谢泳先生指出，罗隆基“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所以，他的性格特征就是“不合时宜”。

民盟也是如此。在建盟之初，它就要在这个独裁的国度里鼓吹民主，在双方用枪杆子对话的时候要求和平协商，在两条对立的“正确道路”之间寻找“中间道路”。它批评一方的话，对另一方也有效。因此不能见容于双方，不能见容于任何时代。

如果说国民党的统治产生了这种“不合时宜”，那么共产党的统治则消灭了这种“不合时宜”。

罗隆基从反对派到“民主人士”，再到“右派”的过程，也是民盟从独立的在野党到附庸，再到“招牌”的过程。“反右”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一个坎，过了这个坎，“新民主主义”就变成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协商”就变成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有多少名目，一言以蔽之，完成了“党天下”。正如章诒和女士所说，一党专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

五七年的这场“运动”以“整风”始，以“反右”终，相应的，对言论的评价则以“帮助”始，以“进攻”终，因为据说“事情起了变化”。其实双方都没有变，但都以为对方变了。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变好了”，共产党认为知识分子“变好了”，结果发现自己只是一厢情愿，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场运动至少证明了，靠暴力与阶级斗争起家的共产党不会放弃专政；另一方面也证明，不管经过多少次整肃，民主宪政的思想也不会在人们心中被彻底抹掉。

罗隆基死了，民盟也名存实亡。不但如此，盟史被篡改，档案在流失，遗迹愈发渺不可寻。章诒和女士写道：“遗迹不在了，心在，魂在，文字在。”这就是历史。

## 顺长江，水流残月

——泪祭罗隆基 章诒和

2007年，反右运动五十年。

海内外的许多朋友对我说：“你应该站出来说两句，写两篇。”

是的，我是应该说两句，应该写两篇的。其实，我早该开口和提笔了。这世间多少值得

珍惜和记忆的痕迹都消磨于岁月，消失在无声无息之中。为什么要等到绝大多数的右派都含冤抱恨而去的五十年后？为什么要等到活下来的右派都已龙钟老态、心碎泪绝？谁都明白，今日的祭奠和补赎，难挽昨天的错误与罪恶。但是无论如何，也要为五十年无祭而祭，为五十年无思而思，即使五十五万右派都到了天堂。因为我们的纪念早已不是为“右派”而作，也不是为我们这些右派子女而为。

五十载岁月，五十万生灵，述说的冲动使我心潮难抑，寝食难安，泪水滴落在文字段落的中间。“心事共疏檠，歌断谁听？墨痕和泪渍清冰。”父辈们早已远去的身影和那场云烟散尽的以中国民主同盟为漩涡中心的政治风云，又重新复活，重新激扬起来。是的，现在的年轻人已然不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为何许人也，更不懂“章罗联盟”——这个反右运动中的关键词了。须用文字记下这些先后被国民党、共产党驱逐出政治舞台、流放于人间之外的人与事。他们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灭，尽管都是败将残兵，其文化生命恐怕要比胜利者更为经久，也更为后人景仰。

《顺长江，水流残月》一文，是为祭奠罗隆基先生而作。因他无子无女，尸骨无存，他的冤魂也不知飘荡于何处？便觉自己肩上有了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一位中共党员身份、曾任政府要职的人对我说：“瞧你们民主党派的那些领导人，比共产党还差劲。人简直就像是没了骨头。”

“差劲，不也是共产党要他差劲嘛，没骨头，不也是你们别的吗？”这是我的回敬语。登时全场沉默，没了话头。

身受羞辱，深感羞耻。“依人”已自不堪，何况以“无骨”鄙之。可扪心自问——自己不也是瞧不起民主党派吗？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些谦卑之相，我不是也要骂几句吗？再说，我与民主党派又有多少联系呢，不也是很久没踏进中国民主同盟的大门了吗？当然，人家也没请我去，也怕我去。

差劲吗？人家还说准了，就是差劲。前不久（2007年3月），无意间看到香港凤凰电视台制作的一期人物节目，说的是民盟中央前主席张澜。节目除了几张老照片，就是几个嘉宾叙述张澜的革命功业。我毕竟关心民盟，关心父辈，其中某些嘉宾我也认识，便也耐着性子看下去。不承想，几个人说了半晌，居然把个罗隆基一笔带过。伤心，酸心，寒心。别老说人家中共抹杀记忆、歪曲历史了，咱民主党派也一个样儿。

好，文章就从这里写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盟上层人士都了解：张澜患有严重口吃症，不善言辞，不善社交，诸事多依仗极具雄辩之才的罗隆基。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张澜那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并呼吁全体盟员继续奋斗下去——“声明”里的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它出自罗隆基之手。罗氏长于议论，风发泉涌，连老蒋也是知道的。所以，1957年民盟中央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斗争罗隆基的时候，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反复交代怎样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张（澜）主席，如何“千方百计把张主席也拉到邪路上去”，乃至“不择手段地利用他（即张主席）、蒙蔽他、控制他……”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当年罗隆基坚持“党派独立”的罪行录，今天看来就是一本功劳簿。水不澄，则不清。中共不澄清，民盟便不澄清？一口黑锅让罗隆基背到死，背到今。这样讲述张澜，张澜就光芒万丈啦？

这里，需要追问一句：到底罗隆基把张澜拉到了一条什么样的邪路呢？其实，所谓的邪路，就是中间道路。中间路线既反对国民党搞的那一套，也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那一套。所以，这是一条两头不讨好、被国共两党左右夹击的艰难之路。父亲早在二十年代就跟随邓演达先生搞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即使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间，他一方面明显靠拢中共，另一方面也仍在暗中坚持搞军事活动。而罗隆

基则是坚守、积极宣扬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把希望的眼光投射在英美派知识分子身上。父亲觉得努生（罗隆基字）的做法太虚，某些主张在中国只能是空谈。上了台面，罗隆基总是备受瞩目、赢得掌声一片；回到盟里，父亲得到的是吸收盟员、建立机构的实际收获。一个在政治理想的天空里展翅，一个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务实。两人各把持一摊（罗隆基负责宣传、父亲主管组织），二人作风迥别，性格各异。对立归对立，但民盟却是生龙活虎的。那时的中国民主同盟，也还真的给中国政治带来一丝新风。许多不满国民党，也不满共产党的人，以为有了出路，有了依靠。难怪胡愈之（中共、民盟交叉成员）在1957年前，对章罗是百般迁就的。当时就有人问胡愈之：“你能对别人发脾气，为什么偏偏对章伯钧、罗隆基那么软弱？”

胡愈之答：“民盟中央没有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章罗。”

“要是没有他俩呢？”

“民盟就会垮掉。”

胡愈之的这番话，后来在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中，被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四十年代民盟成立，中共也看中民盟，因为它是有政治号召力和思想活力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参加民盟，不等于愿意跟共产党走，故对民盟很下工夫。比如重庆旧政协开会的前后，周恩来总是主动上门，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来商谈。周鲸文回忆道：“周恩来商谈问题一般都不在客厅，而是约在罗隆基或我住的房间。”那时，我家住北碚的半山新村，周恩来爬上走下地来走访，与父亲协商问题。林彪在重庆负责统战工作只有数月，他也曾探望父亲。当时张澜、张君勱、黄炎培、罗隆基以及父亲在内，都不想完全切断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与陈诚之间、罗隆基与宋子文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交往和私人情谊。恰恰老蒋死命挤压民盟，盯梢，跟踪，暗杀，直至解散，硬是把个中间道路堵死，硬是把个民盟推到中共一边。加之，毛泽东及时放出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高扬“联合政府”的旗帜，它们终于打动了这些民主人士。务虚的罗隆基、务实的章伯钧都相信了。尽管他们都不信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但都觉得中国历史进程的确需要“民主主义”，中国社会的确需要“联合政府”。无论作为政党、还是作为个人，这些民主人士都觉得在“联合”期间，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就在这个时候，章罗的分歧显露出来。分歧表现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特别是在沈钧儒、史良等救国会成员参加进来后，父亲为了第三党的地盘和实力，与这个被称为“中共外围”的救国会结合在一起，成为民盟中的左派。当然，民盟选举的时候，第三党和救国会争抢份额，父亲也和沈钧儒拍桌子。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5月1日，毛泽东就口号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致电沈钧儒、李济深，说明此举已成必要，时机业已成熟，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号召召开新政协。

父亲和沈钧儒是民盟的左派，自是闻风而动。第二天（5月2日）即与其他党派的负责人聚会于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5月4日父亲与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联名通电，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此后，沈钧儒和父亲等人还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书面和口头谈话。除了肯定中共“五一”号召是和平民主的具有建设性的号召以外，沈钧儒还认为“五一”号召表明中共并非实行一党专政，中共也绝无包办国是之意。

民盟中央把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事，迅速通知了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不料想罗隆基并未闻风而动、跟着表态。他“挟持”张澜主席，为其起草了一封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四个民盟中常委暨在港中委，要求大家在发表文件时必须留意两点：一，成

立的政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民盟是绝对独立的政治集团。沪港两地，左右对峙。民盟四大头牌：沈钧儒、章伯钧与张澜、罗隆基姿态各异。“一个蹴起秋千出林杪，一个折回罗袖把做扇儿摇”。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这是成心从中共作梗，而且就是给中共“作梗”的。

一不做，二不休。当初，张澜允诺每月从上海给香港总部汇款。从香港总部响应“五一”号召后，罗隆基就设法阻挠，中断了汇款。这使得1948年夏秋两季的香港民盟总部处境十分困难。难怪一直负责民盟组织工作的父亲大骂罗隆基，说他要是坏起来简直像个小人。罗隆基为啥要切断粮草？理由不也是明摆着的吗？你香港民盟总部已经接受中共的领导，走向“一边倒”了。既然背离了民盟宗旨，我干嘛还支持你？

此后，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商议，又是罗隆基起草执笔托人带信给民盟中央，要求在征得沈钧儒、章伯钧同意后，民盟中央必须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三项：一，实行协和外交，莫倒向苏联；二，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不要彼此交叉渗透；三，民盟要和中共订立协议。政纲不同的话，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这三项是要求，也是声辩。而末尾的第三项是张澜一再表示坚持的：“民盟要保存批评权利。”罗隆基支持张澜，他对中央统战部专门负责党派工作的于刚说：“联合政府中，各党派是并立的！将来若以批评作为政治罪，则不接受。”在一片混声合唱中，罗隆基坚持独唱，发出了绝不作伪的声音。

那时的民盟是有风骨的，也是有样子的。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有所预见。预见什么？预见民盟极有可能在一种虚假的“联合”与“平等”中，丧失自主性。信件言辞峻厉，峻厉的后面是忧惧。信件是托吴晗带的，但还没交到沈钧儒、章伯钧手里，就遭到楚图南（中共、民盟交叉人员）等人激烈反对而搁浅。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张澜倚重罗隆基是对还是错？我们可以作出掂量——张澜倚重罗隆基是光彩还是耻辱？需要说明的是，张澜自己就是个很有政治主张的人，要不然组建民主政团同盟时，三党三派也不会让他来出任主席。比如1948年外国记者访问张澜。张澜说：中共与苏联共产党不同，希望毛泽东做铁托。采访文章发表后，有人觉得张澜的话需要更正。于是，罗隆基立即另写了一篇文章，找到张澜。张澜瞥了一眼稿子，道：“讲了就讲了，更正啥子！”一口川腔。

如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靠中共养着。我为了写父辈的故事，曾到民盟中央寻找材料。人家告诉我，由于定期及时上缴中央统战部，民盟早就没有自己的档案了。惊骇万分：一个政党的历史居然由另一个政党管着。说穿了，就是不要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历史和记忆！一个熟悉内情的朋友告诉我：“像你父亲和罗隆基这样的顶级人物，在统战部的档案是单独存放，均以名字标出。材料也多得吓人，令尊大人的档案大概有一人高。”我想，罗隆基档案也该有五尺多厚吧，因为他一辈子写日记，一日不缺的日记。反右过去五十年了，章罗也去世四十多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30年解密之规定，反右档案早已过了保密时效性，该解密了。可至今为何依旧密封？请告诉我们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你说不解密吧，偏偏去年（2006年）文物市场拍卖章伯钧写给中央统战部的信函，被我的好友购得。朋友拿出，让我一辨真伪。看着父亲清淡的行书字体，看着“扣”在上面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血红大印，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今年年初（2007年）黄苗子从香港回来，也对我说：“你父亲的字，好贵呀。”父亲不习书法，肯定又是他的信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依据我六十年的人生经验，遇事决不可往好处想。我的初步判断是：上边从东欧的颜色革命获得了启示，开始有步骤处理（即销毁）档案了。统战部管理的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是名家、大家。比如叶恭綽，郭沫若，张伯驹，沈尹默，启功等。于是，有人在“处理”的时候，也就“藏匿”了一些——它们太值钱了！卢梭说：“时间能揭开种种帷幕。”时间能揭开当代中国的种种帷幕吗？

现在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原来不过是一个部的副部长、一个省的副省长、一所高校的校长、一家医院的院长罢了。也不知道他们对民主党派有多少认识、又有多少感情就来当头头，从前捞不到的诸多名利和众多实惠，轻而易举捞到了。干个三五载，谁个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且一当就是十年。为了官位长久，还献媚统战部，打击本党人。“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可悲、可怜、可耻的处境因年深月久，已经让我们的民主党派颇为适应了，稍有“恩泽”，便感激涕零。以至于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司机调到中国农工民主党机关，也变得威风凛凛。我的嫂子曾偷偷在厨房对我说：“民主党派可怜呀，人家不要的司机，我们也顶在头上！”心在蒸煮，血在煎熬。如此不堪，婢妾不如。

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政治上消沉，对民盟极其失望。1952年的7月9日，于刚被上边指派，约罗隆基做了一次长谈。罗隆基开诚布公地向中共表达并解释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他首先说明1949年前某些被中共怀疑的问题。比如自己和美国人的关系。他说自己从未拒绝与美国人见面，以前见面是劝美不要援蒋，后来见面则是希望中共不要靠近苏联。他还告诉于刚，司徒雷登想来北京，托他带话周恩来：假如不“一边倒”，新政权可以从美国得到大批借款。

他与于刚的谈话，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党派如何存在？罗隆基从昆明时期就认为中国有三个政党就够了，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一个民盟，取消小党派。罗隆基后来还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合并小党派”的建议。李维汉说：“这些问题你不要担忧。我们有政策。”说毕，与罗隆基拉拉手。罗隆基很奇怪，这个话题怎么就不能讨论呢？连我也听罗隆基劝父亲：“伯钧，你那个农工党就别搞了，全放进民盟算了。”后经过打听，罗隆基才弄清楚了一一原来“小党派不要合并”是毛泽东的意见，毛说：“既然开销（指民主党派）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继而，罗隆基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盟内的中共党员应该公开身份。毛泽东立即说：“你不要清党！”俨然领袖语气、帝王口吻了。有了这样一句，罗隆基还能反驳吗？他只能检点自己，遂向于刚解释，道：“当时我不了解形势，不知道要有领导党的党员来作为盟的骨干。”中共是领导党，民盟哪能与之并立？罗隆基的心，可能凉了半截：自己被骗了！民盟被骗了！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以践行西方政治思想为职志的人，必须承担又难以承担使命的严峻性、严酷性。是的，严峻又严酷。可见，五星红旗尚未升起，毛泽东对民盟便已刀剑相逼、一脸的无情无赖了。才几年呀，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蜜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

罗隆基同于刚谈得最多的内容是民盟中央领导权的问题。长期以来，罗隆基备受指责的是他拉小圈子、闹宗派，将矛头指向把持大权的沈钧儒、章伯钧。这是为什么呢？事情并非像人们所言，纯属权力之争。罗隆基认为民盟从一开始就是集体领导，但1949年后民盟的集体领导就没有了。在1949年11月20日至12月4日召开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章罗两大派别即为设立几个副主席而争执不休。后经周恩来建议，设立11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争论才平息下来。结果也还算满意：主席张澜，副主席沈钧儒。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黄炎培、马叙伦、罗隆基、史良、彭泽民、周新民、周鲸文。可会议到了闭幕的时候，楚图南突然提出要设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由主管组织工作的章伯钧担任。罗隆基立即表态反对，张澜也不同意。周恩来闻讯立即邀请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夜谈。罗隆基和张东荪拒绝出席，让周恩来一等再等，等到半夜12点。周（恩来）大怒，派人把罗（隆基）、张（东荪）叫来，并当面申斥。这事在当时极为轰动，1957年也成了罗隆基反党的一大罪状。此事我在“一片青山”一文中有所叙述。但是，当我看到罗（隆基）于（刚）二人长谈的文字材料后，我才明白罗隆基强硬无礼的原

困了。他不是不能接受章伯钧，而是他不能接受这种做法。原来民盟的副主席、秘书长等人事，早就是中共与民盟左派定下的。他说：“这种做法，我反对！排定一切，而且布置好了，利用周恩来来念名单，那我何必去呢？民盟搞事先排定，这是民盟集体领导的失败，变为三头制（即张澜——沈钧儒——章伯钧）……这是制度问题！政治局也不是政治局了，重大问题早商谈好，才拿到政治局来讨论。”

谈及关于民盟的派系问题。罗隆基开门见山，道：“民盟是有派系的团体。过去是与反动派系民（即民社党）青（即青年党）二党作斗争。现在明明是左派联合起来对付右派了，却偏要说这是进步与落后之争。”“我在家里请张东荪、潘光旦谈谈盟内的事，就说我搞宗派。章伯钧一个月请七百人客饭就不说。如此下去，盟内任何会议都会变成若干人对付若干人。组织宣传会议主持人胡愈之、辛志超完全是有计划有布置地斗争我，布置人来如何对付我的发言。要知道我是无组织，无布置的。张东荪、潘光旦又不是搞斗争的人。开会不是帮助我们，而是打倒、斗争、打倒。因此，我是相当消极。盟员说我代表宗派，代表落后。无党派的朋友则同情我，说我怎么不如1949年前了。几年来，在宣传委员会我是没做很多工作。我建议写盟史，无人理会。胡愈之、周新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员）却到处作报告，报告盟史。这是宣传工作，至少应与我商量。《光明日报》说是政治局领导，宣委会指导，实际上是章伯钧社长，胡愈之总编，萨空了（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秘书长，我无从过问。说起办报，我的经验不比章伯钧少。《盟讯》也是这样，说是宣委会管，可总编辑是章伯钧。章伯钧走后，就交给了胡愈之。”

“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罗隆基谈及民主党派的生存状态、民盟的派系斗争和自己的被动处境，不正是“三处愁相并”吗？一生的民主梦不也是“一夜梦难成”吗？最后，他心情沉重地说：“我有个人主义，盟闹得这样，我有责任，但责任是双方的。请问统战部，我今后如何自处？我的存在对民盟有无好处？没有好处，我就想退出民盟。这几年，驳白皮书，各党派的联合宣言等文件都是推我起草，而又总说我落后。我认为从1949年后，我在政治上的大方向是对的，如果说我有思想问题，那就请统战部设法来领导。”——这次谈话，中央统战部高度重视。整理后的书面记录，直送李维汉和其他几个副部长；接着，呈送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呈送毛泽东。

不错，罗隆基是个人主义者；罗隆基想做官，想做高官。他在于刚面前、也在其他人面前，常抱怨自己的职务要比章伯钧、黄炎培、史良少多了，很不服气。但是，这些都不是罗隆基的基本追求和最终理想。罗隆基1912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19年，是他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1921年，罗隆基留学美国，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再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师从拉斯基。1928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南开、西南联大。他归国后第二年，就在《新月》杂志上刊出了《论人权》。这篇长文和以后几篇文章里，把人权理论说得个浅白透彻。他不依托以往的人权理论，靠自己的功力提出了人权的三个基本点：（1）维持生命；（2）发展个性，培养人格；（3）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的确，罗隆基不像现在的研究者把人权问题写成书，洋洋万言，喋喋不休，叫人越读越糊涂。他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贡献，是论证了——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人权”。他认为：是一个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达。表达思想就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说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责任。在社会方面，这是思想上的参考材料。这就是人群达到至善的道路，这就是人群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和人格。取缔个性和人格，即系屠杀生命，屠杀个人的生命，屠杀人群的生命。罗隆基还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

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瞧，多么出色而简练的人权定义和表述！再联想到如今中国人权状况的缓慢发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是想痛哭一场。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体系及其阐释，不仅针对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党治”。他的提倡人权和反对“党治”，也是针对中共的。对中共的暴力革命，他也同样视为是对人权的侵犯。1949年后民盟在统战部领导下，居然也搞“几个人说了算”的做法。对此，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罗隆基必须忠诚于他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信仰。罗隆基曾得意洋洋对我说：自己写过多少社论，受到多少人的欢迎。他写下的所有社论，他写下的每个字都是在呼吁民主、自由。现在连民主同盟也没有民主了。没有民主的民盟，他就要退出！这里，有没有与中共“要价”的因素？有没有与沈钧儒、章伯钧“争权”的因素？即使有，我也觉得它们都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应该说，罗隆基的一生都在为人权与法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能获得稳固的地位而努力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人权理论先驱和实践者。反右的时候，都说罗隆基官瘾大，架子大，脾气大。今天看来，他做官是有前提的，并非是无条件的。民盟中央的人，常说父亲大度，罗氏褊狭。若把人缘因素排除，依我看——罗隆基即使褊狭，也是极富深度的褊狭。

如果非要说罗隆基有错、有罪的话，就正如学者谢泳在《罗隆基评传》一文所言：“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就是罗隆基！无论谁当政，他都不会受欢迎的。所以，父亲说：“努生是个出色的反对党议员！”

章罗分歧结束于何时？结束在1957。不是他们主动和解的，是毛泽东结束了他们的分歧。也是毛泽东使章罗关系从此水乳交融！水乳交融——这是一个大右派分子、同时也是后来充当统战部眼线的人向上边写书面汇报时的用语。

罗隆基和父亲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二人结成真正的同盟。他是我家的常客。一屁股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谈当下的新闻，谈从前的故事，谈中共，谈民盟。谈到反右的前前后后，可谓“百感茫茫交集也”。共产党公开背信弃义，民主党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背叛与变节的时代。这里，有三点认识，章罗是一致的。第一：假如没有反右运动，中共搞掉民盟，是迟早的事。因为这是第三势力的必然结局。第二：反右使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这个成功的实现，靠众多力量的合成。其中也包括来自民主党派的力量。中国是个多么复杂而落后的社会啊！第三：也是最重要之点，1949年后，民主党派从国库开支经费，就开始丧失政党的独立性。民盟参与新政权之时，便取消了自己的纲领，盟章第一条就写明：“本盟是以共同纲领为纲领。”继而来的另一条就是“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说，这就给民盟定了位不过一块“招牌”而已，民主党派已名存实亡了。一个农民政党窜上了政治巅峰，它必然视公民为臣民，而要求臣民的，当然是朝觐和效忠了。

父亲常说：“民盟为了一致对付国民党，与共产党联手‘合作’了。无论怎么联手合作，都不是拥戴你为王。”

罗隆基老说：“民主党派的问题从‘共同纲领’开始。”讨论新宪法草案的时候，他又对父亲说：“什么新宪法，还是‘共同纲领’！”父亲听了，只有苦笑。

罗隆基死后，父亲虽还有些聊天的朋友，却再也没有谈话的对手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靠左还是偏右，无论你才气纵横，还是慷慨大度，站在手握枪杆子的国共两党之间，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痛苦和耻辱。

2007年3月底，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接受采访。记者问：“你觉得1957年反右的后果是什么？”

我说：“后果是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成功实现了一言堂，成功实现了一个人说了算。”

难道不是这样吗？毛泽东果然为所欲为了。于是，有了庐山会议，有了三年大饥荒，有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是一个人说了算，故而，有了废黜胡耀邦，有了废黜赵紫阳，有了六四枪声。

啥是后果？这是后果！——反右五十年，祸害五十年。不是吗？

前年（2005年）的秋天，与上海朋友吴洪森、钱文忠吃茶闲聊，说起章罗旧事。

吴洪森说：“章大姐，你说自己这辈子没有青春，没有爱情。但依我看，你是有初恋的。”

“我和谁初恋？”

“和罗隆基呀。”

我大笑：“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八道，完全有依据。”吴洪森口气还挺硬的。

“依据在哪儿？”

“就在你的笔下。通篇文字你对罗伯伯多有情意呀——”

我心头一阵紧，一阵悲。回到家中，独坐至夜深，想到我的罗伯伯夜半痛苦死去，无人搭救的凄冷情景，眼睛便湿润起来。“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我明知贯云石这支〔落梅风〕曲子，用在这里是很不妥帖。可我就是引它，咏它。别者远行，今夕何夕。千种情思，万般怀想都凝炼成这“起头儿一夜”了。中国有几个像罗隆基这样杰出的政治家？有几个像他这样懂得女人的男人？于我而言，唯一的遗憾，那时岁数太小！今天最让我痛心的是，当《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一文发表后，提出强烈抗议的竟是与罗隆基往来密切的女友的后代。我搞不懂：做罗隆基的女友就是“脏”了你、“黑”了你、“毁”了你吗？当初史良能在“文革”批斗会上挺胸宣告“我爱他（即罗隆基）。”怎么史良的旁系子女就受不了，向统战部告状？就像1957年批判章伯钧的人，大多数来自民主党派内部一样。五十年后，民盟中央的人要求查禁《往事并不如烟》的信函，在统战部堆了一摞。相隔整整半个世纪，社会有何变化？世相有何不同？接近我的朋友都知道：章诒和悲观厌世。遽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失，一切是空。我怎不悲观厌世？！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我们见面了。我说：“我在罗先生的文章里提到您。您不介意吧？”

“不，我很高兴。”杨薇这样回答。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我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1898年，罗隆基出生于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2岁以前，一直在此居住，留美归国后曾三次回乡省亲。故居建于清末，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江南民间庭院风格。院子直面水塘，墙面青砖砌成，内室全部用木板隔成。在正厅开窗采光处存有“文光射斗”等墨书大字，前檐下还有许多诗词及民俗图画。2002年，它被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原有居民迁出。

旧居年久失修，墙体剥落，缺损严重。2003年，当地部门决定将故居进行全面维修，建立罗隆基故居。报告递交到中央统战部，结果可想而知。据说是电话答复的，做派和中宣部一样——没有文字依据。答复的理由是“建立罗隆基故居，现在不能办，还不是时候”。请问中共中央统战部：什么时候才是时候？贵党的第三代领导人都在修缮故居了。国民党重要人物李宗仁、戴笠、胡宗南等人的故居纪念馆也相继落成开放了。为什么第三势力的代表人



物却是如此境遇？——是恨他们？还是怕他们？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能否站出来，讲两句呢？我们是公民，我们有权知道。

现在的盟员恐怕已无人知晓，民盟中央办公地点——位于北京王府井翠花胡同内太平胡同一号的那所大宅院，是父亲一眼选中的，梁思成看罢，连连说“选得好！”那时父亲手中钱少，还是向黄炎培借款买下的。

如今，大宅院也快拆光了，剩下几棵老树，一座假山，半截游廊和精美绝伦的大厅。大厅已经出租，费孝通取名“翠园”，专办满汉全席。前年（2005年），几个朋友在那里给我过生日，我穿着一身黑衣去了，像个吊孝的。看着身著旗服穿梭其间的餐馆小姐，心里沉重得很。我知道这里曾经聚集了多少天下才俊，又游荡着多少冤魂苦鬼。

根据民盟中央1961年10月20日发布的一份内部的右派情况材料里提供的数字：1957年的反右，民盟有5173人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盟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六。单是民盟中央一级（即中委、候补中委）61人，占中委、候补中委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听听他们的名字吧，就足以震撼你。

副主席2名：章伯钧，罗隆基；

中常委12名：曾昭抡，费孝通，潘光旦，黄药眠，钱端升，沈志远，韩兆鶚，潘大逵，马哲民，叶笃义，郭翹然，丘哲；

中委27名：吴景超，钱伟长，刘王立明，费振东，宋云彬，王毅斋，彭文应，陈仁炳，王国松，朱裕璧，何公敢，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曾庶凡，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鲜英；

候补中委20名：浦熙修，陶大镛，王文光，丘克辉，吴重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尘，张纪域，张广标，梁若尘，章振乾，陆钦墀，舒军，胡一声。

我认为：民盟中央就该在这个翠园，为自己五千余名右派成员立块纪念碑，碑就叫“右派碑”！碑的正面，是一个右转箭头图形；碑的背面，是中国民主同盟反右史。环绕它的是一座半圆形护墙。护墙的每一块砖，刻写着一个右派盟员的姓名。姓名，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列。这是民盟的苦难历史！这是民盟的无上光荣！

集中押送右派去劳改、去送死的甘肃夹边沟，河北的茶淀，黑龙江的兴凯湖……一切承载右派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掩埋着死者的血泪，碑上镌刻着生者的记忆，还有无尽的思考。

岁月湮远，遗迹也有渺不可寻的一天。遗迹不在了，心在，魂在，文字在。

2007年3—4月北京守愚斋

##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大陆版补遗）

按：《往事并不如烟》和《最后的贵族》是章诒和先生同一著作的两个不同版本，于2004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两种版本均收录了《一片青山了此身——

罗隆基素描》一文，我们将大陆版缺失或与海外版不同的内容，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凡是《最后的贵族》（简称海外版）有而《往事并不如烟》（简称大陆版）没有的，都用黑体字标出；凡是两个版本文字有不同的，也用黑体字标出并加说明。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而那时的父亲，正跟中共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眼前的现实，使他难以认识到“接受党的领导”的深远含义。

这里，我又联想起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件事：罗隆基一直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修改宪法的总则部分。1956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部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像一部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具体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定。在这方面，父亲的觉悟要晚些。他是从事事必须请示统战部、交叉党员过多、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行为与现象中，才懂得什么叫“接受党的领导”，并认识其理论荒谬。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毛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页 342——343——海外版；279——大陆版，下同）

父亲认罪在先，而且很快，对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没有骨气”。而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道让中共认错？老毛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页 326；291，为“让人家”。）

罗隆基……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像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述。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分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右派的罪状。”

……

罗隆基……说：“我爱搞小集团，他毛泽东就不搞小集团啦？说我搞阴谋活动，他毛泽东就不搞阴谋活动？伯钧，鸣放就是阴谋哇！”

……

父亲补充说：“恶梦里的魔鬼，就是那个高喊‘长期共存’口号的人。农工的人揭发，说我攻击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现在看来，这魔鬼的部分越来越大了。”（页 332——333；296）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就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体的社论，根本是错误的。民盟在给我划右定性的材料里，特别写明一条——‘罗隆基反对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先在共产党内讨论然后提出商议的做法。’我是

一直反对中共这种做法的。反对的原因也很明确，因为这种做法属于党治，不合国体呀！现在怎么样了？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常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罗隆基的九载清华校园生活以及留学生涯，使他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着跟他同代知识分子很不一样的认识。……我想已是右派的罗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国家尚无法，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罗隆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经历反右运动，他是愈发地坚持了。（页 334——335；297）

父亲对我说：“老罗的话虽不错，但他太天真了。”

我问：“罗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

父亲讲道：“他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认识共产党。比如，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人揭发，伤害了老毛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么一部机器操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做做样子。”（页 335；297）

关于反右后的民盟，是父亲和罗隆基谈论的另一个话题。

父亲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老毛这次的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党派，也完全控制了知识分子。而中国的民主力量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精神，本来就脆弱。今后，民主党派只能点头称是地过日子。”

罗隆基则预言：“在民盟那些积极批斗、恶语中伤我们的人，将被统战部提拔重用，并坐上我们腾出的位子。”

父亲很同意这个看法。他俩一致判定胡愈之要当上副主席，邓初民、吴晗、杨明轩三人也都极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像千家驹等人，大概会从中央委员晋升为常务委员。而杀回马枪的史良，也一定会保住自己的位子。（页 335——336；297）

罗隆基说：“伯钧，从现在的政治现实来看，我在 39 年草拟的《期成宪章》并未过时呀！当初国民党政府借助战争需要，无限制地膨胀权力，现在的共产党不也如此吗？在《修宪草案》里我提议设立一个监督政府、防止滥用权力的机构，这个提议现在不也适用吗？比之从前恐怕是更加地必要了。”

“是的。”父亲附和着。

罗隆基继续说：“41 年成立民盟，无论你搞的第三党，还是张君勱和我代表的国社党，都是以建立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为奋斗目标。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有十条。除了强调抗日主张，它的核心政略概括起来有两项。一个是要求政治民主化，另一个是主张军队国家化。而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就是结束党治。伯钧，不知道你还记得不？我们在这方面写得很具体呀！比如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机关、学校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严行避免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包括政党活动之所需经费等等。”

父亲说：“这些条款都是针对国民党的，所以老蒋看罢，对张表方（即张澜）大发脾气。其实在发表以前，黄炎培怕对国民党刺激太大，就明确要求删去反对国库负责党费等条款。”

罗隆基接过话头，说：“那时的共产党是支持我们的。他们也接受‘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而且特别指出要先实行政治民主化。现在看来，执政的中共也步国民党之后尘，上得台来，就把自己的政党自命为‘国家’。”

扯到这些话题，父亲回顾了第三党的历史，并说：“当初搞第三党，就是既不赞同国民党，也不欣赏共产党。邓演达是这个观点，我也是这个观点。45年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四十九条政纲，在国家制度的模式上我们就是明确‘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其中还特别强调把英美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与苏联的经济民主结合起来。”

罗隆基感叹道：“可惜呀，我们美好的设想和进步的主张都成为泡影和梦幻。”

“努生，你想过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成为泡影与梦幻的原因了吗？”父亲问。

“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我们都把共产党、毛泽东想得太好了，二由于我们都做了官了。两者相结合，使得我们这些人既是被动地、也是主动放弃了从前的主张。”

罗隆基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阵，说：“伯钧，你讲对了，我们是这样的。其实，肃反、三五反的搞法，我们是有思考的。张东荪的案子出来，我们也有警觉。”

父亲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面对武力起家的共产党，书生的思考和民主党派警觉顶个屁用！”

父亲的激愤，令议论戛然而止。（页 338——339；299）

他俩（按：章伯钧、罗隆基）的议论有时一致，比如都认为中国抗战的胜利**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有两个，**蒋介石和罗斯福**。他们有时看法各异。（页 340；200，为“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还有罗斯福”。）

民盟发起人之一、哲学家、政论家张君勱曾说：“学政治（学），要在英国。学哲学，要在德国。”罗隆基和父亲刚好就是这样的知识组合。为什么有这样知识的人，**咱们伟大领袖**偏偏不喜欢呢？（页 342；301，为“有人”。）

父亲和他（按：指罗隆基）谈论反右的话题，如若涉及到人，罗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第之语，也当作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揭发——‘高饶事件是共产党内部的宗派主义’‘什么场合都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听多了，便觉得肉麻。’‘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出兵是明显的干涉别国内政，社会主义阵营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文艺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等等。她在新闻界的批斗会上揭发我的事情，可以讲，是条条致命呀！”（页 342——343；301）

1959年的夏季，毛泽东在庐山搞起了反右倾运动，在党内挖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家来聊天的罗隆基说：“这有什么奇怪？章罗能联盟，他们也就可以成为集团。**这肯定又是毛泽东下的结论。**”

“右派、右倾，**老毛**如果总是这样定罪的话，国家的政治生活，今后要不得了。特别是中共内部的斗争，**非常残酷**。发表的公报和事实的真相，往往相距甚远。”父亲很有些忧虑。

自己灾祸缠身，何必替他人担忧——罗隆基多少怀着这种情绪，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德怀和我是连襟，但素无往来。我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异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伯钧，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居然说，应该，应该。”

父亲解释道：“人家是共产党，当然要这样讲啦。”

罗隆基不以为然，说：“像他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阶级阵线划得分明，不会理解和同情民主党派。这次轮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许能有一些‘法’的觉悟，不会老指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页 347——348；306——307）

他们（按：指章伯钧、罗隆基）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政策出于实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种炫耀心情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论，即使右派是罪犯，他们也比任何一名战犯干净。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手上，没有血痕。其实，无论是父亲还是罗隆基，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成功以后，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怀疑眼光审视现实的人。（页 350；308）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叫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现，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57年5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孑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孑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分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份，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份而自豪。（页 366——367；322）